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法国汉学研究丛书

FAGUO HANXUE

YANJIU CONGSHU

II

郑炳林 主编 / 耿昇 译

法国藏学精粹

ESSENCE OF FRANCE

TIBETOLOGY

敦煌学、藏学、西域史学被西方泛归为汉学范畴。欧洲的汉学研究最早是由几个航海大国发起的，但是法国人很快就成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研究执牛耳者，法国学者在敦煌学、藏学、西域史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为汉学研究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Essence of France

Tibetology

法 国

藏学精粹

郑炳林 主编/耿 昇 译



读者出版集团
DUZHE CHUBAN JITUAN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藏学精粹 / 郑炳林主编; 耿昇译.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6-03912-0

I. ①法… II. ①郑… ②耿… III. ①藏学—文集
IV. ①K28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4862 号

策划编辑:李树军 马 强

责任编辑:李树军 党晨飞 宋学娟

美术编辑:马吉庆

法国藏学精粹

郑炳林 主编 耿 昇 译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47.875 插页 8 字数 1287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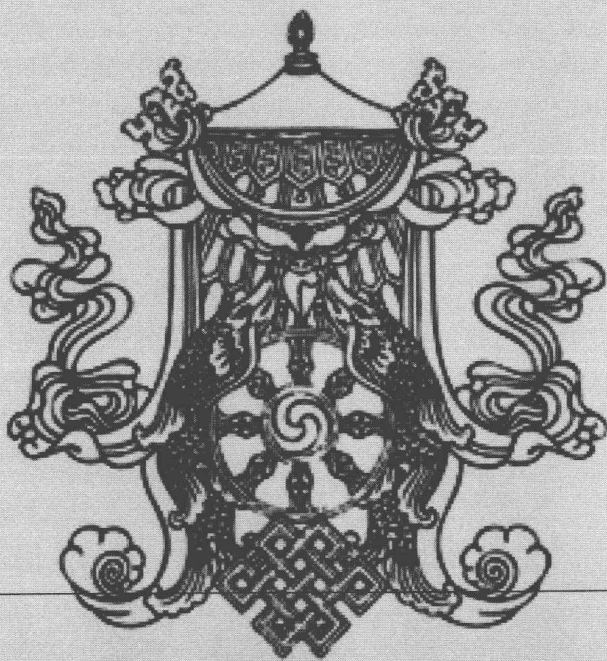
ISBN 978-7-226-03912-0 定价(共 4 册):200.00 元

目录

- 五世达赖喇嘛的雕像 A. 麦克唐纳 (1201)
- 西藏法器摩羯罗嘴考 石泰安 (1238)
- 敦煌写本中的印—藏与汉—藏两种辞汇 石泰安 (1251)
- “吐蕃”名称源流考 路易·巴赞 哈密屯 (1328)
- 古藏文 RGod-G-yuñ 考 乌瑞 (1354)
- 敦煌藏文写本综述 石泰安 (1363)
- 敦煌藏文写本中的某些新发现 石泰安 (1374)
- 法国 50 年来的藏学研究 安娜—玛丽·布隆多 (1380)
- 《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 1 辑简介 石泰安 隋丽玟等 (1393)

《敦煌古藏文文献辑》第2辑简介

- 今枝由郎 麦克唐纳等(1402)
“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卷考察 吴其昱(1440)
法国的藏学先师雅克·巴科 玛塞尔·拉露(1448)
法国的藏学泰斗石泰安教授 耿昇(1456)
法国的女藏学家玛塞尔·拉露 让·菲利奥札(1465)



五世达赖喇嘛的雕像

A. 麦克唐纳

波士顿精美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尊小雕像，已由普拉塔帕迪蒂亚·帕尔(Pratap aditya Pal)先生作了介绍，并在他与曾献纪合写的该博物馆的一次叫作《喇嘛教艺术》的展览会的展品目录中刊登了照片。这尊雕像的照片就是图 54，在第 52 页是这样描述的：“济依西贝则的一尊 18 世纪时的西藏青铜像。高 13 厘米，它是阿尔德里奇的礼物。底座的题识把该雕像确定为喇嘛教宁玛巴的济依西贝吉。这尊青铜雕像是由其非常虔诚的弟子阿旺喜饶委托制造的。该喇嘛穿几件僧袍，左手执一部写经，右手放在左腿上。这尊雕像是由其弟子在其大师圆寂后不久，委托制造的，这一事实保证了该躯雕像的质量。它具有典型的僧人仪表，头已受剃度，但其面部则具有明显的特征，显示出它具有严厉的个性。西藏人喜欢宣传他们的僧侣，同时又加以神化，为他们画了像，结果便在这个地区发展起一种有意义的图像学传统。这类画经常是理想化的，但有时候（像现在这样的情况）又有一种很明显的写实主义倾向。”

帕尔先生所介绍的喇嘛的身份及其弟子的见解，由于没有提供原文对照，所以他参考的说明无法核实。而他准确地指出喇嘛面容处理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却使人感到震惊。我们只要看一下前一页的照片，就可以深信不疑。帕尔先生强调（第 18 页）济依西贝吉雕像与阿底峡、宗喀巴那样一些著名信徒、五世达赖喇嘛或其继承者们雕像习惯处理相反的现实主义，是有道理的。

“但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 17 世纪以后，我们看到了一些画，它们可以透露出一些著名人物的情况，也许还可能保存有某些外形肖像，宁玛巴的济依西贝吉的像即属此例。这些相貌各不相同，个性（严肃的弟子）充分地表达了出来，所以这些画像可以被看做是相当真实的图像。”

因此，如果说帕尔先生把所介绍的人物称为济依西贝吉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图像和与之相符的雕像的加工才能，就赋予了这尊雕像一种帕尔先生意想不到的价值。人们确实是仅仅通过概念的和不带个性的外表，来了解西藏的某些著名人物。但济依西贝吉远不是 18 世纪一位默默无闻的宁玛巴的喇嘛，而是达赖喇嘛本人的一个密教名字。帕尔先生很难考证出这一点，因为五世达赖喇嘛和曾谈论过他的西藏大师们很少使用这个名字。在那些提供了有关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各种名字的资料西方人士中，伯戴克（Petech）先生是第一个了解到济依西贝吉就是五世达赖喇嘛本人的学者。他在为 T·V·韦利（Wylie）的《西藏地理》所写的书评中一条说明（载 1963 年的《通报》），作了这样的考证。他当时还不知道苏联大西藏学家 A·I·沃斯特利科夫的杰出著作。这部著作撰写于 1936 年，直到 1962 年才用俄文出版，1970 年在加尔各答被译成英文，其书名为《西藏历史文献》。在这部令人赞叹不已的著作中，沃斯特利科夫列了一张有关五世达赖喇嘛各种名字的基本还算很完整的表（印度版本，第 46 页），其中就有济依西贝吉这一名字。我将于下文重谈这个问题。至于阿旺喜饶，则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名字，我们在西藏文献中发现了数名与五世达赖喇嘛同时代的人以此命名，且不提其他时代的僧人了。然而，在能够释读刻在波士顿雕像背部的铭文之前，就这一问题提出任何假设都是冒险的。对阿旺喜饶的考证始终是以赋予他的尊号为基础的。如果在铭文中提到了他，那仅仅是由于通过他们行使的职务和享有的尊号，我们可以把阿旺喜饶与其他称呼区别得开，因此，当我收到波士顿博物馆于 1976 年 11 月寄来的铭文全文的影印件时，觉得十分兴奋和惊喜。

由于收到的时间较晚,所以本文显得不成熟,在许多方面是不完善的。但对题识的释读解开了所有的疑窦,证实了济依西贝吉的图像确实是五世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是西藏最大的政治家之一,于1642年创建了西藏地方政府,是一位不仅在政治领域中,而且在艺术、文学和宗教思想方面也都能代表他那个时代的人物。所以我觉得现在就通过某些对照比较介绍这一文献,以便使大家能够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如同大部分可以澄清其意义的文献一样,该文献是我与两位藏族老师和朋友达布活佛和允丹嘉错,共同释读的。我不知怎样感谢他们的合作。那些经联结和删节的两个单音节的词组,已在注释中进行了分解,那些应归咎于铭文雕刻者,而不是撰写者的技术方面的错误,也都一一指出来了。

下面是译文,本人力求翻译其意而不追求文字的准确和典雅:
“祝愿莲花生^①慈悲^②的阳光,使利益阿旺喜饶的百瓣(荷花)^③绽放。

祝愿(这个太阳的)光源永远在他心中闪耀,永不离开他。

为了他今生和永世(一直达到菩提)。萨贺尔僧人撰。

按清册的登记表,我的首席喇嘛、所有着那^④中的最著名者济依西贝吉这尊雕像体内的佛物,包括他本人的头发和一颗佛牙等。这尊能满足愿望和需要的雕像(同宝物一样),被视为司供祭之官阿旺喜饶的支柱。”

我们看到,这段铭文包括两部分,分别由两个人撰写。第1部分采用诗体,是萨贺尔僧人为阿旺喜饶写的。第2部分由阿旺喜饶亲自撰写,并在其名前面加上了他的尊号:司供祭之官。正是他让人制作了其喇嘛济依西贝则的塑像,他把它誉为佛陀,并把主要供物——他的头发和一颗佛牙放入雕像内。因此,这尊雕像外部以其模特儿的人格化表现,内部以其使之神化并赋予他生命的要素,成为喇嘛本人的替身及其弟子虔敬的支柱。

甚至在分析和展开由这段铭文提供的线索之前,我们就可以断定,其表达方式证明了两件事实。其一是用来确保阿旺喜饶吉祥如意祈祷诗的署名名人萨贺尔僧人,以及由其弟子司供祭之官阿

旺喜饶代表的济依西贝则喇嘛,仅仅是同一个人,其二是这位大师的雕像是在喇嘛尚在人世时,由其弟子制造的。

实在说,第一种事实更为明显地容易使人接受,因为我们通过其他部分而获知,这两个名字都是西藏无与伦比的重要人物五世达赖喇嘛对自己的名字的指称。相反,除了达赖喇嘛本人之外,我们可以排除其他任何人用第一个名字称呼他的可能性。事实上,“萨贺尔僧”一词,与五世达赖喇嘛家族历史悠久和传奇性的起源有关。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这是达赖喇嘛从其传记开始,通常用来签署各种著作的自谦字眼。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只有他才可以使用这个名字。他同样也是唯一一位自称“萨贺尔家族的老密教徒”,或“萨贺尔密教徒中的老疯子”,还有西藏大人物经常自封的其他带贬义的用语,我们不可设想别人会用这些名字来称呼他。因此,毋庸置疑,铭文中的诗体部分是由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写的。

我于上文已经指出,沃斯特利科夫曾提供了五世达赖喇嘛拥有的各种名字的一览表,但他始终未能具体解释它们的用法。所以,当他指出“五世达赖喇嘛的名字更经常的是被其绰号‘萨贺尔僧’(来自贺尔的信徒)^⑤代替”时,并没有考虑其实质内容,即这是只能由他“萨贺尔僧”一人使用的绰号。因此,我可以简单追述一下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的主要名字,其中包括济依西贝吉。

我同样感到奇怪的是,1617年出生于吐蕃王国摇篮的琼结王公家庭的这个孩子,在刚满数月时,就从觉囊巴达若那他大师那里获得了第一个名字。达若那他的人格和教理,后来成了五世达赖喇嘛猛烈攻击的对象,以至于使其寺庙改宗,其财产被没收,其作品被禁止,其后裔被流放到了蒙古哲布尊丹巴那里^⑥,但当时却被请求为小王公选择一个名字。达若那它在藏文中叫贡噶宁保。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中的一段文字,对“道登的化身”不太恭维的文字中(《云裳》第1卷,第23页正面)告诉我们,他为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贡噶米珠多结旺吉甲保。这个孩子诞生于无论是西藏还

是其家庭都很动乱的时代，西藏被以宗教竞争为基础的政治斗争所分裂，这些分裂也反映在其家族中。他首先被考虑成是在他诞生不久前圆寂的噶玛巴喇嘛和主巴噶举喇嘛的转世灵童（《云裳》第1卷，第25页背面）。

后来，甚至在格鲁巴内部，承认他是哲蚌寺僧侣们的殿宇之一的甘丹颇章的四世活佛转世的观点，也并不是被人毫不犹豫地接受的。诞生于1619年的同时代人扎巴坚参在他被承认是一位地位相同的喇嘛，哲蚌寺上部僧侣殿宇喇嘛的化身之前，也被其家族说成是四世达赖喇嘛允丹嘉错可能的化身。1621年，在当时统治西藏的藏地统治者的政治赞许下，在其精神权威于格鲁巴中无可争议的两位大师，林美夏仲·衮曲佩和札什伦布寺的堪布班禅喇嘛的宗教担保下，以及四世达赖喇嘛家族蒙古人的赞同下，琼结的小王公被正式承认是允丹嘉错的“新化身”。1622年，在甘丹颇章举行了座床典礼，萨贺尔家族的这个孩子就成了该寺的第五代化身和主人。他在5岁时进入教团，从班禅洛桑索尼嘉仓（1567—1662年）处获得了洛桑嘉错的名字（《云裳》第1卷，第30叶正面）。到了1638年，在他21岁时，他发了比丘（藏文为dge-slong，梵文为bnikshu）愿，林美夏仲在他前一个名字中又增加了“阿旺”的名字（《云裳》第1卷，第86页背面）。这就是五世达赖喇嘛（嘉错，意为“海洋”，在蒙古文中被译成“达赖”）正式名字的历史和意义，一般又以缩写形式阿旺罗桑嘉错的名字出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是他受戒僧的名字。在该名字之外还可以补充其他名字，都是当他在以下各领域获得深奥知识之后被授予的，在学习了作诗（藏文为snyan-ngag，印度又为kavya）之后被称为江央噶瓦谢年；在学习了印度文法（kalapa）^①之后又被称为东珠聂巴朗曹。他于1656年写成的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占星术著作中的署名是阿旺洛桑嘉错晋美高恰土丹朗曹岱。他从中还增加了可能是他于1653年北京之行时，天朝皇帝封给他的名和号的藏文对音^②。

至于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在灌顶以使他进入特殊的密教教宗

的时获得的梵文名字,有的是由同时代的大师相赠,有的是由过去的喇嘛在显圣期间授予的,这类名字很多。莲花生上师授给他的名字是金刚无著(在一次显圣或授记中),在这之前于《莲花遗教》^⑧的题跋中,他用的名字是才曲多巴者。他还享有梵天子笑金刚的名字,在《吞木浦》第2和第3卷的多种小部经文中使用^⑨,他还享有济依西贝多吉(笑金刚)的名字,这个名字是由阿旺喜饶取的,刻在波士顿收藏的雕像背部,五世达赖喇嘛在我们下文将提到的列城版本的《秘传》^⑩第368页中,以及在《吞木浦》第3卷第199页中都使用过该名字。由于这一名字也用于1820年由藏博喇嘛所著的《世界(南瞻部洲)广说》中,所以很明显,它在大众场合中也使用,而不仅仅在受度僧们的小圈子中流行。

然而,在小雕像的题识中,没有任何内容可以使人作出断代。我们可以将之与由《云裳佛服》第3卷提供的资料进行比较。五世达赖喇嘛在一段文字中提供了一份小部佛典、愿文和其他著作的目录,这是他于1679年6月19日在庆祝委任他的第五位,也就是最后一位摄政官、著名的桑结嘉错的欢乐气氛中写成的:

“我借专为多吉列巴和四臂(怙主)神举行遮食回施供的机会,写了一部容易携带的仪礼书,应我寺(私人的密教寺)僧侣们的要求,我写了一篇赞扬阿旺亦列的愿文,按这位大活佛的指示写了要题在唐喀背面的一篇文章……在塔林大师的要求下,我为摄政官和我本人写了一部长寿仪轨书……向透彻地理解了宁蒂的大圆满派祖师白玛赤来以诗的形式写了一封回信;……奉献给阿旺赤列大堪布的愿文,这种愿文既可以用作赞扬,又可以被看做是供茶(按这一种或另一种方向作改变的最后程式);我为由司供祭之官制作的我的—尊镀金铜雕像——图像写了一篇题识,为拓制一篇有关佛陀行为的文献写了最后愿文,该文献由比亚的格桑嘉错撰,由比亚的万户杰布扎西刻。”^⑪

我几乎完整地翻译了这个句子,以不至于对插入这一小段文字的背景产生了误解,而它对于确定波士顿小雕像的时间是很重

要的。它证明 1679 年的这一天,五世达赖喇嘛为由他的司供祭之官给他定制的一尊雕像写了一篇题识,而当时司供祭之官的头衔则是由阿旺喜饶享有的。这是否就意味着波士顿所藏小雕像的时间,可以由《云裳华服》的这条附注断代呢?不,因为在波士顿雕像使用的材料(青铜),与 1679 年司供祭之官命令制造的那尊雕像的原料(镀金铜)之间,存在有矛盾。我们曾要求波士顿博物馆作过一次实验室分析。虽然我们可以确定小雕像的金属质地,但仍无法知道,对于 17 世纪的西藏人来说,从科学角度讲的“镀金铜”含义是什么。相反,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有关《云裳华服》记载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是说首先是《云裳华服》记述 1679 年出现的事件间的关系那部分的真实性。

无论是从其篇幅,还是从其内容来看,这一不朽的作品在西藏自传本文献中的都属最重要者之列。因为正如苏联大西藏学家沃斯特里科夫正确指出的那样,它含有对西藏两位较大的政治家的回忆。他提出既有关这部著作编写的历史,又关系到前 3 卷出版时间的问题,前 3 卷大部分系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所作,但不是全部。对《云裳》6 卷的最佳概述,既包括由达赖喇嘛所作的一半,又包括由第悉所作的一一半的简述,是沃斯特里科夫所作的那一种:“包括普通西藏版式的 6 卷。其中有 3 卷(分别为 364、281 和 241 页)是由五世达赖喇嘛本人写成,收入 6 卷中。它是按年代顺序阐述的,最后的叙述是蒙历的辛酉(铁鸡)年(1681 年)1—9 月间发生的事情。剩下的 3 卷(分别为 360、338 和 383 页)是这部未定著作的补编,是由第悉桑结嘉错写的,从 1692 年开始,到 1696 年完成。”^③在紧接着列举前 3 卷的一条注释之后,沃斯特里科夫斯基又指出:“据第悉桑结嘉错认为(在其补篇最后一卷,第 378 页正面),最后一部是由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写成的。”

基于第悉书第 1 卷(《云裳》第 4 卷,第 161 页背面)的两段文字,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详述了。他首先描述了其师 3 卷自传的基本结构:“虽然从实质上来说,上师(如达赖喇嘛)的‘渐入解脱’(为

了方便,我们把这一术语仅仅译作‘传记’)都不会出错,他们的根的本质与修成的佛陀一样,藐视文字记载,这位贵人还是亲自写了其外传^④《云裳华服》的前两卷,即第1卷和第2卷,同时还写了第3卷的第1部分和该卷第2部分中的主要内容。这样一来共有3卷。”稍后不远,即在第162页正面中,第悉又解释了五世达赖喇嘛赋予其回忆录书目的意义,并提供了下列时间表:“外传叫作《云裳的漂亮的平纹细布》,因为根据对律和论的疏注,此名指一种高价布,它不能遮盖皮肤,很透明光亮^⑤。同样,与其他人的那些仅仅讲述与他们功劳有关的传记相反,这部珍贵的著作非常清楚地论述了善与恶。第1卷和第2卷一直论述到1675年(包括该年在内)这一木兔(乙卯)年,这是由五世达赖喇嘛上师亲自写成并已印制;在第3卷中,就已完成撰写和校对的部分来看,包括一直到达1677年这一火蛇(丁巳)年1月15日之前阶段。紧接着,作为(达赖喇嘛)传记画的基础的文献,以对一直到1679年这一土羊(乙未)年6月14日事件的记叙,都已写好,但未经他修改。对于后文,即从1679年6月15日到1681年这一铁鸡(辛酉)年的9月7日,他仅留下了某些手稿笔记,以摘要的形式对最重要的事件作了概述,需要与从外面(即由其他人,其书记们)所作的笔记进行对照。运用这些笔记进行编纂、以对最引人注目事件所作的概述为基础、再用其他人的笔记进行补充的人,就是他最忠实的弟子和密教徒^⑥江央扎巴。从1681年这一铁鸡年的9月8日起,这位喇嘛王爷,这一外表世界和法的世界最漂亮的装饰物,没有留下有关任何事件的笔记。”

因此,对五世达赖喇嘛为其司供祭之官,于1679年6月19日所作的题识的记载,属于这位大师借用其亲信成员的资料,以补充笔记的形式所写部分。所以,我不能排除一种假设,即在由曲本官制造的五世达赖雕像所使用的材料问题上,在达赖喇嘛可能未写完全部的虔诚的题献目录中,出现了错误。

另外,我们知道,摄政官对于1682年2月25五世达赖喇嘛的

圆寂,一直保守秘密到1697年。我们刚才已看到,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在圆寂时未完成的自传,在1692年(第悉补编部分的开始写作时间)仅印刷了三分之二,第3卷尚未刊印。另外,我觉得对阿旺喜饶雕像资料的信任,取决于此人在五世达赖喇嘛晚年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在他圆寂后所起的作用(如果他确实起过作用的话)。至于波士顿所藏小雕像的时间问题,如果说没有任何资料可以使人断定其时间,这一看法也不完全正确,其时间是在阿旺喜饶行使司供祭之官职务的时候。那么这一职务都包括些什么呢?其职权是什么呢?其次是否可以确定阿旺喜饶开始行使职务的时间呢?

“曲本官(司供祭之官)”这一尊号,由五世达赖喇嘛私府中最为显赫的成员之一森琼格享有。“森琼”的意思是“小住所”,指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中的居室。其个人卫队的士兵被称为内侍,其家族成员叫作禁卫,其中的‘gag’意为“进口,通向……的道路”。因此,属于他的亲信中的人都可以“进入其居室”。为了简单地确定达赖喇嘛这一私舍的作用,我还可以指出,在当代,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前地方政府的成员,如觉灯大喇嘛先生在前一代达赖喇嘛时就已任职,熟知1959年之前所存在的政府的组成),确定了西藏地方政府三大类官吏的组成与职能如次,贵族世俗官吏,即仲科尔(drung khor),由一个内阁(噶厦)主持,处理政务;僧官,由“大秘书”主持,负责宗教事务,达赖私府,即禁卫,由仪轨师,即大礼宾官负责,由为达赖喇嘛私人服务的宗教官吏组成。私府不同成员的组成和具体职责尚未被全面研究过,尚不为人所知。我仅仅知道大礼宾官负责官方正式节日的历法编制工作。

西藏地方政府创设于1642年,取名为甘丹颇章,意为“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宫殿”,哲蚌寺是靠近拉萨附近的格鲁派的三大寺院之一。五世达赖把西藏统一在蒙古王子固始汗(他获得了“藏王”的尊号)、哲蚌寺的甘丹颇章的管家索甫群佩(他成了该地方政府的行政官或摄政官)和五世达赖喇嘛的三重权力之下。我现在尚难肯

定五世达赖喇嘛是否像伯戴克先生较晚时代所说的那样,是“自外来的和上部来的”,肯定是他独自一人握有教权。他的特殊地位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由于五世达赖喇嘛还施加过很大的政治影响,同时也是因为这个要人主宰了他那个时代的整个历史。这一特殊地位后来被掩盖起来了,甚至被否认了。

近代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拥有长期管理西藏事务的经验,从内部了解这些事务,认为甘丹颇章自从 1642 年创设以来,特别是在 17 世纪下半叶期间设立了上文提到的三种官吏。我的意图不在于在此写一篇西藏地方政府的歷史,因为这一课题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本身尚需要研究。然而,有一事实却提出了一种很有可能的假设,与对我们本文研究的五世达赖喇嘛的曲本官职能的分析,具有直接关系。对由甘丹颇章的创立者们、五世达赖喇嘛及其第五位第悉桑结嘉错所写的史料的分析,证明了存在有两种而不是三种官僚队伍。五世达赖喇嘛及其继承人的地方政府是根据萨迦巴地方政府(我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已指出了这一情况,它不包括宗教分支)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包括一支由世俗人和出家人组成的官吏队伍,即僧俗官吏;此外还有达赖喇嘛的私府,由僧侣组成,即禁卫^⑧。我所看到的当时的所有文献都倾向于证明,这一私府的作用在 17 世纪时比僧官队伍(尤其是孜仲)^⑨创立的时代要重要得多,行使了一部分过去由禁卫完成的职务。

下面就是有关五世达赖喇嘛私府组成资料的某些片断,不过还需要深入研究。有一段很重要,但却很难理解的文献,因为它既涉及贵族组织,又涉及 1672 年创立新年的庆祝节日。据这段文献来看,达赖喇嘛的私府似乎已经由一位大礼宾官主持,私府中共包括 35 名成员(《云裳》第 2 卷,第 128 页正面和背面)。一名索本(gsol-dpon),其字面意义为“司起居官员”。这一官职与“王室总管”相当一致。因为负责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及其客人席宴的人,只能是一位达官贵人。这一段文字中还提到两名香火。但是,根据我对《云裳》的释读,真正有影响的官吏成员数目不可能超过 12 人左